

编者按:

20世纪中国神话学的百年探索与发展,是中西学术交流语境的一个重要成果。如何呈现这一学科史及其代表作品,是中国神话学史研究的前沿问题。近十余年来,我们与中国神话学会合作,以话题讨论、学者观察、田野报告、前沿争鸣等形式,一方面大量刊发年轻学者的神话学研究新成果,另一方面,宏观策划,整体展示,2015、2016年先后刊发了24位中国神话学家的最新论文,介绍他们的整体研究,全面评述其神话学研究贡献,勾勒出了中国神话学较为清晰的当代景观。基于此,为呼应前两年中国神话学家的集体表达,2017、2018年我们致力于扫描国际神话学的世界群象,着重对12位西方神话学家及其相关学派、论著,作出理论、方法和学术史价值等方面的梳理,以期完成中西学术交流对神话学西方来源的基本论证,为中国神话学科史提供新的意义。本期特推出王树福博士《阿法纳西耶夫与〈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神话思想》及丁晓辉博士《阿兰·邓迪斯的神话学研究》,敬请学界关注并惠赐佳作。

阿法纳西耶夫与《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神话思想

王树福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在俄罗斯民间故事学、神话学和民俗学学术史上,A.H.阿法纳西耶夫整理编撰的《俄罗斯民间故事》被视为俄罗斯神话资料与民间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价值。总体说来,该故事集体现出比较强烈的比较神话学派特色,包蕴着至少三种比较明显的神话学思想:民间故事是神话思想的重要物质载体,神话气象说是民间故事的内在本质,斯拉夫民族意识是民间故事的思想核心。总之,《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神话学思想资源、类型化叙事艺术和多元化艺术修辞,对俄罗斯神话学、民间口头创作和近现代文学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神话思想;比较神话学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7)04-0001-06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俄罗斯帝国疆域的渐趋稳定与人文学术的日趋规范,在阿法纳西耶夫(A.Н.Афанасьев)、达利(В.И.Даль)、雅库什金(П.И.Якушкин)、基列耶夫斯基(П.В.Киреевский)、雷勃尼科夫(П.Н.Рыбников)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一系

列俄罗斯民间故事集先后问世,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的发展:“1855~1863年出版了A.H.阿法纳西耶夫的八卷本《俄罗斯民间故事》(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1860~1862年И.А.胡佳科夫的《大俄罗斯故事》(Велико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收稿日期:2017-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WW042)

作者简介:王树福(1980-),男,山东临沂人,副教授,博士,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俄罗斯戏剧、俄罗斯文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1860年《雅库什金收集的俄罗斯民歌》(Русские песни, собранные П. Якушкиным), 1865年《来自雅库什金收集选本俄罗斯民间歌谣》(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песни из собрания П. Якушкина)相继问世。1860~1874年出版了十卷本《基列耶夫斯基收集的歌谣》(Песни, собранные П. В. Киреевским), 1861~1867年又出版了四卷本《雷勃尼科夫收集的歌谣》(Песни, собранные П. Н. Рыбниковым)。1861年,出版了В. И. 达利的《俄罗斯民间谚语》(Пословиц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等。所有这些极其丰富的资料,成为俄罗斯比较神话学派研究的对象。”^{[1](P118)}作为俄罗斯19世纪下半叶影响深远的的神话学派,比较神话学派最著名的代表学者主要有阿法纳西耶夫(1826~1871)、米勒(1833~1889)、科特利亚列夫斯基(1837~1881)、胡佳科夫(1842~1876)、普雷若夫(1827~1885)、雷勃尼科夫(1831~1885)^①。“诸如А. А. 波捷布尼亚和А. Н. 维谢洛夫斯基等19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学者,在他们科学活动的不同时期,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也曾赞同并运用过神话学派的思想。”^{[1](P118)}

受19世纪中叶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民族意识高涨和民俗学研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А. Н. 阿法纳西耶夫根据田野调查和研究心得,整理出八卷本的煌煌巨作《俄罗斯民间故事》(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极大地奠定了俄罗斯民间故事和神话学的研究基础。作为19世纪俄罗斯著名民间故事研究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家,阿法纳西耶夫身体力行,参与并创建了俄罗斯比较神话学派。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神话学研究和民间故事整理两个方面,其学术声誉建立在研究民族学并出版相关论著上,其思想基础是民族学起源与发展的神话理论,其代表性学术著作是三卷本《斯拉夫人对自然的诗 意 观》(Поэт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славян на природу, 1865~1869)。“根据在神话学和原始人语言的形象性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原理,阿法纳西耶夫树立了一套严谨的关于神话观念,以及后来由神话演变出诗歌创作的产生过程的学说。”^{[1](P118)}19世纪俄罗斯神话学派的研究对象是民间口头创作和俄罗斯古代文学,它们“比较清楚地反映了独特的人

民性格,人民关于自然界、关于世界的观念”。该神话学派认为,神话就其本质而言,“是原始思维的一种形式,是人们认识和解释周围自然现象和自身生活的一种手段,是史前人的艺术创作活动的基本形式”^{[2](P589)}。

在俄罗斯民间故事学、神话学和民俗学学术谱系中,《俄罗斯民间故事》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民间之书。经由阿法纳西耶夫,读者首次看到俄罗斯故事所有的丰富与不同,它朴素的美丽、无省略和无修饰。不同于自己从事搜集和出版民间创作的前辈,阿法纳西耶夫致力于保留一手资料故事的所有独特性,自己不对这些资料进行任何文学润色,只起着编辑和出版者的作用。”^{[3](P111)}总体说来,该故事集体现出比较强烈的比较历史神话学派特色,包蕴着至少三种比较明显的神话学思想:民间故事是神话思想的重要物质载体,神话气象说是民间故事的内在本质,斯拉夫民族意识是民间故事的思想核心。这三种神话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阿法纳西耶夫的比较神话学理念,是其神话学理念在民间故事文本中的生动呈现。

一、民间故事是神话思想的重要物质载体

按照俄罗斯民俗学主流观点,民间故事一般可划分为三种故事类型,即动物故事(сказкао животных)、神奇故事(волшебная сказка)和生活故事(социально-бытовая сказка,或译为社会—生活故事)^{[4](P38),[5](P449)}。三种类型虽然在故事主角、叙述策略、审美特色、艺术修辞等方面彼此不同,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原始多神教或东正教的潜在影响,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是俄罗斯神话内容的物质载体与文本呈现。

其一,民间动物故事有其独特的界定、叙事结构和语言特点。并非所有描写动物的童话都是动物故事,“唯有动物被作为主要客体或叙述主体的故事才称之为动物童话。它们有别于那些把动物作为配角,使其只起辅助作用的故事”^{[6](P301)}。在俄罗斯民间动物故事中,主人公多以拟人化或人格化形式出现,或以狐狸、灰狼、狗熊等森林动物为主角,或以

① 关于俄罗斯比较神话学派的更多详情,可部分参阅 П. А. Николае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0, С. 106~122, 166~199; Рус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 1-31. М. и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6~2001.

羊、狗、鸡、鸭等家禽动物为主角,或以鸟、鱼、虾、蜘蛛、蝴蝶等其他动物为主人公^{[5](P451~453)}。民间动物故事以未经驯化的森林动物为主,约占动物故事的三分之二,狐狸、灰狼、狗熊等多以强者面貌出现,充满比较强烈的自然野性和自由灵性;以经过驯化的家禽动物为辅,约占动物故事的三分之一,羊、狗、鸡等多以弱者面貌出现,具有比较明显的伦理归属与集体意识。比如《狐狸、兔子与公鸡》(№.14)^①讲述狐狸贪心不足,霸占兔子住所的故事。兔子出于好心,将无家可归的狐狸让到树皮屋中,狐狸却反客为主,将兔子扫地出门。猎狗、狗熊、公牛纷纷替兔子鸣不平,却先后失败,最后,在公鸡的帮助下,树皮屋得以物归原主,兔子和公鸡从此友好相处。

其二,作为“首先与‘童话’联系在一起的民俗学文本”^{[4](P45)},神奇故事大致形成于中世纪时期,故事情节在现实世界和魔幻世界中交替进行,有固定的结构元素、叙事功能、语言修辞,有功能不变的故事人物(即施害者、赠与者、帮助者、公主或其父、委派者、主人公、假主人公),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固定性、结构化和功能性特征^{[4](P46~48)}。比如,在《哈符罗雪奇卡》(№.100)中,孤儿哈符罗雪奇卡心地善良却生活艰难,在主人三个女儿的监视下整日劳作。在神奇母牛的帮助下,她轻松完成织布、漂白、磨光等一系列工作,最终获得年轻多金意中人的青睐,过上幸福生活。开篇议论“世界上有好人,有不太好的人,还有些人连奴役别人也不觉得害臊”^{[7](P1,120)},体现出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假恶丑的鞭挞。在《不知道的故事》(№.295)中,射手安德烈与公主玛丽娅之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神奇爱情故事,经历了恶毒国王的三次考验,分别是去阴间见死去的老国王,到遥远王国带回咕噜猫,到不知何处的地方去、带回不知何物的东西来。三次考验引出三个精彩纷呈的故事,呈现出人物不同的道德品性。事实上,来自民间的多神教等民间原始思维,通过民间神奇故事得到源源不断的传播发展:“一些反映古斯拉夫人多神教观念的神话传说,也(在俄罗斯民间创作中)得以流传。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教会竭力想根除多神教的遗迹,便与‘异端’风俗、‘魔鬼游戏’和‘渎神行

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斗争。然而,这些民间作品的形式直至19~20世纪仍保留在民众生活中,后来才逐渐失去了其始初的宗教含义。”^{[8](P11)}

其三,作为“一种有独特内容、独立定型化虚构、特殊诗学的独特故事形式”^{[5](P475)},民间生活故事主要包括生活短篇故事、冒险故事及其他类型故事^{[4](P53)}。按B.Я.普洛普的观点,生活故事主要包括聪明姑娘、考验妻子、幸运猜测人、狡猾小偷、强盗、主人与雇工、僧侣、傻瓜、恶妻、小丑、道德十一类^{[6](P245~291)};按B.П.阿尼金的观点,主要包括家庭生活、主仆、僧侣、小偷与士兵四类^{[5](P479~483)};按Э.Ф.沙弗朗斯卡娅的观点,主要包括妻子、社会冲突、劳动问题和智慧解答、傻子群体、傻子个体、冒险故事六类^{[4](P54~60)}。每一类的人物形象、叙事结构和思想诉求各有侧重,各有不同。比如,在《凭狗鱼的吩咐》(№.167)中,懒散的叶米良打水时捉到神奇的狗鱼,在狗鱼的魔法帮助下,以口诀“凭梭鱼的吩咐,照我的愿望”,经过跳水砍柴、自我保护、求生上岸、建造宫殿等重重考验,完成从懒散邋遢到积极乐观的精神锻造,最终和公主玛丽娅一起幸福生活、管理国家。

无论是动物故事还是神奇故事抑或生活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以通俗形象的语言修辞营造了一个五彩斑斓的艺术世界,与贫乏庸常的现实世界既彼此呼应又相互对立。在神奇的艺术世界中,飞毯可以自由穿行,神靴可以快速移动,死人可以意外复活,动物可以开口说话,单调乏味的现实世界变得丰富多彩,充盈着浓厚馥郁的神话特质或神话倾向。整体说来,俄罗斯民间故事都具有或浅或显的道德教诲和伦理功能,都把自由人性、伦理意识和寥廓天地视为最高的审美享受和道德情操。

二、神话气象说是民间故事的内在本质

在阿法纳西耶夫看来,民间故事、民间口头文学、古代史诗、谚语、俗语、俏皮话、教会诗歌等文学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包含着神话内容或神话因素。关于神话的本质问题,阿法纳西耶夫主张气象说。他认为,自然界有许多截然相反、相辅相成的

① 在三卷本《俄罗斯民间故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1985年版)中,阿法纳西耶夫对每个独立故事(或主题系列故事)一一进行了编号,共有579个俄罗斯民间故事。此外,该书第三卷还附有45个被宗教审查剔除的民间故事。因此,三卷本《俄罗斯民间故事》共计收录624个主题故事。根据俄罗斯民间故事和民俗学研究惯例,凡引用《俄罗斯民间故事》,一般只标注故事编号。详情请见A.Н.Афанасьев,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в трех томах. М.: Наука, 1984~1985.

常见现象,诸如白天与黑夜彼此转换,光明与黑暗相互交替,温暖与寒冷规律变化,寒冬与酷暑剧烈更迭,雄性与雌性相互吸引。这些对立并置的现象都受到自然气象规律嬗变的影响与主宰,是气象变换的具体体现与表现症候。生活在神奇秀美的自然现象中,人们必然会对此产生兴趣与疑问,并把自然现象人格化、拟人化,从而产生令人神往的神话。本质来说,丰富多样、五彩斑斓的民间故事,包蕴着自然人格化、神格化、神圣化的神话基础:“阿法纳西耶夫用《斯拉夫对自然的诗意观》,充分揭示出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神话基础。”^{[1](P120)}作为俄罗斯人原始思维的一种形式,民间故事是古代斯拉夫人接触、认识和解释周围自然现象和自身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与手段。

作为人类与动物世界关系的艺术投射^{[5](P491)},俄罗斯动物故事在叙事主体上有强者—弱者、善良—邪恶、美好—丑陋等二元对立的分类特点,在风格修辞上具有象征性、隐喻性和讽刺性等类型化特点,在情节发展上则具有简单化、简洁性和模式化的特征。比如在《大牙齿狗鱼的故事》(No.81)中,狗鱼仗着大牙齿和大块头,吃完河中各种小鱼,由于贪婪而咬上鱼钩鱼饵,结果成为渔夫的美味鱼汤。就目录编排而言,《俄罗斯民间故事》将以同类动物或人物为中心的故事放置在一起,相互对比,彼此呼应。比如,《狐狸妹妹与狼》(No.1~7)、《狐狸媒婆》(No.9~13)、《狐狸、兔子与公鸡》(No.14)、《忏悔的狐狸》(No.15~17)、《狐狸大夫》(No.18)、《哭泣的狐狸》(No.21、22)、《农夫、熊与狐狸》(No.23~26)、《绵羊、狐狸与狼》(No.28)、《狐狸与松鸡》(No.31)、《狐狸与啄木鸟》(No.32)、《狐狸与大雁》(No.33)、《狐狸与虾》(No.35)、《猫、公鸡与狐狸》(No.37~39)、《猫与狐狸》(No.40~43)、《熊、狐狸与农夫》(No.48)等不同篇什,皆在很大程度上以狐狸为故事主角或发展动力。就篇目辑揽而言,阿法纳西耶夫特意将主题相同、表述相似、情节类似的故事放在一起,冠以同一标题,彼此之间相互比较。《狼》(No.49、50)、《猪与狼》(No.51、52)、《狼与山羊》(No.53、54)、《熊》(No.57、58)、《山羊》(No.60、61)、《狗与啄木鸟》(No.66、67)、《鸡》(No.70、71)等诸多类似故事,均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文与异文,形成彼此呼应和相互比较的态势。事实上,动物故事的形象特质、风格形成和特点确立,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即古代动物崇拜和图腾信仰,社会讽喻口头叙事习惯的确立,对儿童进行教育传播的目的^{[5](P454)}。

作为人类社会关系的审美呈现,俄罗斯生活故事借助定型化虚构和艺术化力量,通过妻子、社会冲突、劳动问题和聪慧解答、傻子群体、傻子个体、冒险故事等类型化故事,呈现并剖析人类的道德素养、思想意识和伦理关系。《严寒》(No.96)讲述后妈区别对待前妻女儿和亲生女儿,让前者在冰天雪地中自生自灭,让后者在严寒天气中备受呵护,结果二人命运却截然不同。该故事将森林中的严寒天气这一自然现象人格化,赋予其神奇的魔幻力量和高度的道德标准。性格懦弱的老头将前妻女儿带到森林中,“放在一棵大枫树下面的雪堆里,自己就走了”^{[7](P116)}。无家可归的小姑娘瑟瑟发抖,浑身哆嗦。“忽然她听见不远的地方,严寒沿着枫树一路哩哩啦啦地响,从一棵枫树调到另一棵枫树,发出哗哗剥剥的声音。他来到树脚坐着小姑娘的那棵树下,低头问她。”^{[7](P116)}在广袤无垠的东欧平原,高大挺拔的枫树是俄罗斯森林常见的树种,哩哩啦啦、哗哗剥剥的声音则是凛冽寒风呼啸的形象修辞。对善良天性的肯定、对道德伦理的认同、对集体意识的肯定、对自私丑恶的鞭挞,则吻合斯拉夫人早期生存环境和集体农业文化的特征。

从地理疆域角度来看,东斯拉夫人主要生活在一望无垠、广阔无边的东欧平原区域,大致介于乌克兰基辅和俄罗斯诺夫戈罗德之间,在黑海以北、彼得堡以南、波罗的海以东、乌拉尔山以西。这片自然条件并不十分优越的地理区域,被茂密阴暗的森林、四处出没的野兽、变幻莫测的天气、严酷剧变的气候所笼罩,不同于雾气缭绕的英伦三岛,区别于气候温润的欧洲大陆,有别于阳光普照的地中海,差别于群山环绕的高加索,更相异于严寒阴暗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绵延不断的森林是东斯拉夫人基本的生存环境。东斯拉夫人在森林和沼泽之间寻找空地,建造房屋并围以土墙或栅栏,形成独立的农家院。他们在农家院周围砍去树木,进行耕作;或在森林中狩猎、养蜂。东斯拉夫人从森林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他们用松树等建造房屋,用白桦和白杨作为燃料,用树皮编成鞋子,制成家用器皿,捕猎林中的野兽和采集蜂蜜。森林还是他们防御外敌的可靠的屏障。但森林中的生活是不容易的:浓密的树林经常隔绝交通,用斧头、火镰等简单工具伐木烧荒开辟土地进行农垦极为艰辛,而费了很大力气开辟出来的耕地和草地仍然很容易被杂树侵占。林中野兽出没,经常威胁人和家畜,盗匪也常在森林中营建巢穴。因此,东斯拉夫人对森林也怀有莫名的怯懦和恐惧,森林

被看作是喜欢捉弄人的林中魔鬼的黑暗王国。”^{[9](P3)}

早期斯拉夫民族所在的地理位置,使其逐渐形成适宜本土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地域性农业文明,与开放性、扩张性、海洋性的商业社会差异较大,甚至截然不同:“俄罗斯人总是以热爱劳动,准确地说,以‘热爱农业劳动’、以组织出色的日常农业劳动为特色。农业劳动是神圣的。俄罗斯人的农业和宗教被强化得无以复加。”^{[10](P34)}这种以集体主义意识、生产资料公有和多神崇拜为特色的情形,强力规训和形塑着俄罗斯此后文化道路的选择:公元988年,接受带有东方特色的希腊一拜占庭文化,在13~15世纪与阿尔泰—蒙古文化融合,在19、20世纪之交与注重感性和直觉体验的东方文艺融会。由此,以村社为组织结构、以东正教为思想意识、以集体主义为主要标准的庄园体制,成为帝俄时期的主要社会经济与文化思想方式,进而导致历代王朝和政府推行的重农主义具有绵延不断的生命力。

三、斯拉夫民族意识是民间故事的思想核心

按照俄罗斯神话学派学者的观点,“神话,作为人类生活史前时期认识与解释周围现实的包罗万象的形式,在人类生活有史阶段的初期,还曾被用来认识和说明实际的历史事件。结果,神话和历史、神话传说和历史传说便融合在一起,产生了特别高大的诗歌形象。”^{[1](P119)}在《斯拉夫夫人对自然的诗意观》中,阿法纳西耶夫写道:“历史生活在斯拉夫人和所有其他民族的神话性的古代传说中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保留在民族记忆之中世代相传的史诗性传说,一定要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局部的、个别的特征,把它们和远古的内容融合在一起;幻想代替了习惯的神灵,让自己的勇士们去同鞑靼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大军鏖战;让代表春天雷雨的勇士变成某个著名的骑士或哥萨克自由民中的英雄。”^{[11](P49)}在阿法纳西耶夫看来,比较法是研究俄罗斯民间故事和神话的重要方法和有效途径。“在研究叙事诗时,即所谓故事歌时,研究者只有坚持比较的方法,只有通过将故事歌的种种异文同其他民族的类似的古代文献和传说进行详细的对照,明确后来的兴废,去掉历史的赘瘤,然后恢复古代传说最古老的原文,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11](P47)}经过阿法纳西耶夫的修正与提倡,这种方法后来成为比较神话学派的“比较历史法”。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在口头民间文学的不同古

文献之间(歌谣、谚语、俗语、咒语以及谜语),故事占有完全显而易见的地位。就其贡献和内容而言,故事与民间词语和充满古老传说的所有其他古文献密切相关,它们表现出诸多艺术与人类学的有趣关系。”^{[7](PI;5)}俄罗斯民间故事以其丰富性、多样性与原始性,用象征化、拟人化或隐喻等方式,在或诙谐幽默或乐观浪漫或悲伤嘲弄的字里行间,将斯拉夫先民的民族意识、民族习惯、民族思维悄然呈现出来。“在我们面前,俄罗斯民间故事展示出一个广阔的世界。……诉说着斯拉夫民族古老的史前生活:自然里的化身,有征兆的鸟兽,魔力与仪式,神秘的谜语,梦境与符号——所有这些服务于从中发展出故事史诗的主题。史诗以其天真的幼稚、强烈的自然之爱和引人入胜的神奇力量,让人陶醉其中。”^{[7](PI;6)}

在《俄罗斯民间故事》中,人与自然之间既抗争又融合、既对立又和谐、既依存又排斥的关系主题,得到充分的体现与细致的书写。无论是在动物故事,还是在生活故事,抑或是在神奇故事中,人类与自然的斗争、人类的日常生活、人类的农业劳作、人类的伦理意识,均带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性特征与地域性特色。在俄罗斯民间动物故事中,狐狸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其多样化的形象书写和复杂化的特征叙述,隐蔽体现出斯拉夫人追求神圣公正的民族意识和崇尚集体主义的伦理思想。狐狸既聪明伶俐又愚蠢骄傲,既不乏公正又狡猾自私,既欺软怕硬又富有正义,既贪婪卑鄙又机智灵活,得到喜爱与憎恶、褒奖与批判、认同与拒斥等多样书写与复杂认知。作为狡猾多变和诡计多端的象征,狐狸诱骗轻信的公鸡(《狐狸、兔子和公鸡》,No.14),设计欺骗灰狼、狗熊和公牛(《猫与狐狸》,No.40);作为恶毒和贪婪的象征,恶狼吞食小羊(《狼与小山羊》,No.53),欺负绵羊(《绵羊、狐狸与狼》,No.28),对恩人落井下石(《忘恩负义》,No.27);作为力量和憨厚的象征,熊既头脑单纯,行动笨拙,欺负弱小动物,又性格爽直,力大无穷,保护弱小动物;作为弱小群体的象征,兔子、青蛙、老鼠、鹅鸟等动物,是被强者欺侮的弱者代表^{[5](P451~453)};作为自然生态的象征物,芜菁长得又甜又大,水灵可人(《芜菁》,No.89)。正是在动物书写和自然叙述中,俄罗斯人不仅加强了对生存环境的认知和对地理疆域的掌控,也强化了对审美心理的把握和对民族身份的认同,由此进一步深化了对民族性格的了解和民族意识的分析。

在生产低下、科学落后、知识贫乏的古罗斯,人

们对无法解释的大自然感到敬畏与尊崇,对自然异常现象和剧烈变化无法理解与解释,由此导致了对栖息其中的大自然现象的祭祀与崇拜。作为古罗斯人的宗教信仰,多神崇拜和祭祀的对象,起初多是大自然的种种日常现象,诸如日月星辰、江河湖海、风雨雷电、森林树木、飞禽走兽。作为古罗斯多神教时期的重要文化症候,民间口头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讲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反映古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表现古罗斯人与大自然的斗争,传达他们的各种感受和体会。古罗斯民间口头创作按照多神教神话的方式解释和说明大自然现象,以多神教意识去认识大自然;多神教诸神出现在古罗斯民间口头创作里,帮助或破坏古罗斯人的生活。此外,有的古罗斯民间口头创作为多神教祭祀仪式服务,成为古罗斯多神教祭祀活动的内容”^{[12](P30)}。莫斯科大学教授乌格里诺维奇则认为:“在神话和各种体裁的民间创作之间有一定的界限。只要人们相信所叙述事件的真实性,神话始终是神话;一旦人们不再相信这点,神话就变成史诗、故事等艺术作品。”^{[13](P87)}

根深蒂固的斯拉夫本土主义观念,使俄罗斯人找到自己民族身份认同的根据。“在古老联系和传统、东斯拉夫人种族、自古以来的语言共同性等基础上,在逐渐形成的共同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法律、意识形态等基础上,罗斯民族的统一意识开始在兴起的古罗斯国家中、在国际舞台的统一行动中、在为‘罗斯国土和信仰’的共同斗争中、在共同的政治生活条件下形成了。罗斯人意识到他们是具有同一的信仰、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气质的人。”^{[14](P114~115)}在民间故事、神话史诗和文学艺术的长期浸润和不断形塑中,早期俄罗斯形成独特的审美特征:艺术媒介和艺术内容与大自然本体重叠,书写、歌颂并神化自然现象;钟情斯拉夫多神教日历仪式和神秘主义意识,痴迷于象征、隐喻等艺术策略和艺术理念,认同斯拉夫民族神话和故事习俗,力图维持本土文化的完整性而生发出与世界文化的差异,等等^①。以民间故事与口头创作等形式呈现的斯拉夫民族意

识,生发出早期俄罗斯独特的修辞策略和审美特征,并逐渐积淀成融会东西文化特征、在东西文化中摇摆不定的民族心理,由此导致俄罗斯文艺的审美方式不仅与西方差异较大,而且与东方和穆斯林地区差异悬殊。

总而言之,作为俄罗斯神话资料与民间故事研究的集大成者,《俄罗斯民间故事》在俄罗斯民俗学和神话学史上极具价值,意义重大。作为俄罗斯比较神话学派的代表学者,阿法纳西耶夫将其神话学理念贯穿在该故事集中,体现出比较强烈的俄罗斯学院派特色。《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动物故事、神奇故事和 life 故事等故事类别,“狡猾狐狸”、“傻瓜伊万”与“青蛙王子”的故事形象,“线性式直线”、“重叠式单线”与“回环式闭合”的叙事结构,“道德教诲”、“惩恶扬善”与“敬畏神明”的故事主题,“艺术叙事”、“说唱故事”与“散韵结合”的艺术风格,“多重主体”、“视角转换”与“简洁明快”的叙事方法,对俄罗斯神话学、民间口头创作和近现代文学,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俄罗斯民间故事》以神话学思想资源、类型化叙事艺术和多元化艺术修辞,奠定了神话学、民俗学和民间叙事文学的创作文本、物质基础和理论资源。及至 19 世纪下半叶,以 A.И.阿法纳西耶夫、И.А.胡佳科夫、Ф.И.布斯拉耶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神话学派,通过大量田野考察、民间搜集和学理思考,不仅搜集整理出丰富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使大量俄罗斯民间诗歌创作获得了科学生命和社会生命,把它们变成全世界财富”;而且“首先把古俄罗斯文学同神话、民间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对古俄罗斯文学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研究”^{[1](P121)}。

参考文献:

- [1] Николаев П. А.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М].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0.
- [2] 刘宁. 俄国文学批评史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3] Пропп, В. Я.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А]. А. Н. Афанасьев.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А. Н. Афанасьева в 3-х томах [С]. Т. I.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7.
- [4] Шафранская, Э. Ф. Устное народ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М.: Академия, 2008.

① 关于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审美特性问题,可部分参阅 A.Н.阿法纳西耶夫的《斯拉夫人对自然的诗意见》、Б.А.雷巴科夫的《古罗斯文化史研究札记》(Б.А. Рыбаков, Из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4)、Д.С.利哈乔夫的《古俄罗斯文学诗学》(Д.С.Лихачёв, Поэтик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Л.: Худ.лит. Ленингр.отд-ние, 1987)和《10~17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时代与风格》(Д.С.Лихачёв, Развити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 - XVII вв.: эпохи и стили [М]. СПб.: Наука, 1998)、В.В.贝奇科夫的《俄罗斯中世纪美学(10~17 世纪)》(В.В.Бычков, Русская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эстетика XI-XVII века [М]. М.: Мысль, 1995)等相关著作。

是布关(汉族),老四是布羌(壮族),老五是布系(说广东话的汉人)”,等等,则是表明多民族兄弟关系不争的事实。密洛陀留下的遗言则成为全诗的要义所在。密洛陀临死前告诫子孙:“独树不成林,万树盖群山。兄弟和好,别人怕你如猛虎;姐妹不和,人家看你像笨羊。与亲邻和睦相处,别人对我们尊敬;和亲友断绝交往,你们就成一盘散沙。”“勤劳,山上的石头会变牛羊;勤劳,树上的叶子会变衣衫;勤劳,林间的花草也会开放;勤劳,河中的清流也会发亮。”“远客来到家,定要酒招待。别给人家吃白饭,别让人家喝清水。喝酒要有规矩,只许用碗不用杯。酒要给喝够,客要给灌醉。”毋庸讳言,人类文明进程并不是时间积累的结果,而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叠加和创新使然,特别是在突飞猛进的现代化与无所不在的快节奏正在不断排挤自我反思空间的当今社

会,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人类数千万年来保留下来的经验与生存智慧,也许这正是诸如创世神话史诗这样的非遗经典留给我们的真正有用的东西。

参考文献:

- [1]王宪昭.中国神话母题 W 编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2](俄)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M].张雅平,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4]叶舒宪.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N].光明日报,2012-08-30(15).
- [5]鲁迅(署名霍冲).拿来主义[N].中华时报·副刊,1934-06-07.
- [6]河池市民委.广西河池市近40万布努瑶欢度传统佳节——祝著节[EB/OL].<http://www.seac.gov.cn/art/2008/07/08>.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The Fun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the Epic of Creation Myth ——Taking Miluotuo of Yao Nationality’s Bunu as an Example

Wang Xianzhao

(Institute of National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creation myth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s a non renew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mankind. Through the decomposition and combing of functional motif of Miluotuo of the Yao’s Bunu,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epic of creation myth is ancient, complete, persistent and practical, and thus play the memory func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the inheritance and func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fe experience, as well as daily enlightenment and behavior norms and other functions. In a word, the fun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reation mythological epics needs to be actively promoted and guided by science.

Key words: the epic of creation my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iluotuo ; Bunu of Yao nationality